



晚清

WANQING
ZHENGZHI
SANLUN

政治散论

任茂棠 主编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晚清

政治散论

WANQING
ZHENGZHI
SANLUN

任茂棠 主编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晚清政治散论/任茂棠主编.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8. 4

ISBN 978 - 7 - 203 - 06066 - 6

I. 晚... II. 任... III. 政治 - 中国 - 清后期 - 文集
IV. D 69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37423 号

晚清政治散论

主 编: 任茂棠

责任编辑: 蒙莉莉

装帧设计: 清晨 (阳光) 工作室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 - 4922220 (发行中心)

0351 - 4922235 (综合办)

E - mail: Fxxz@sxskcb.com

Web@sxskcb.com

Renmshb@sxskcb.com

网 址: www.sxsk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新华印刷分公司

开 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 张: 16.25

字 数: 400 千字

印 数: 1 - 2000 册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3 - 06066 - 6

定 价: 38.00 元

对晚清政治的一些思考(代序)

任茂棠

1980年,我开始担任中国近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便开始招收晚清政治研究方向的研究生。人所共知,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中国近代史学界,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大家研究的内容和成果,重点集中在“三次革命高潮”上。尽管近代中国的绝大部分时间仍然处于清朝的统治之下,但是学术界对清朝本身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人物等各方面的研究却不尽如人意。基于此,我就把研究方向确定在晚清政治。至于从哪些方面去研究晚清政治,当时做了以下思考。

所谓晚清,其时间断限学术界各有所指,主要分歧在于上限。有的认为应从嘉庆朝开始,有的则认为应从光绪后期开始。我们认为,晚清的时间断限是从道光二十年(1840)至宣统三年(1911)清朝灭亡。晚清政治的内容是很广泛的,诸如国体、政体问题,有关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制度以及各种政策,还有外交问题、战争问题,以及一些重要的政治人物,都属于晚清政治的范畴。然而,从对晚清政治进行研究的角度考虑,其内容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五个问题”和“两条主线”。

所谓“三个方面”,是指道光二十年(1840)开始清朝制定各种制度和方针、政策的依据而言。因为自道光之后,清朝的某些

制度和方针、政策的变化,主要受三个方面的影响,即受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外国列强的侵略和统治阶级内部派系斗争的影响。例如:咸丰三年(1853)设立的厘金制度,无疑是同太平天国对清朝的打击有直接的关系;清政府长期坚持的闭关政策,是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才完全放弃的;20世纪初年,清政府的“新政”又与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有直接关系;义和团运动中清廷对内、对外政策的实施和变化是在顽固派和洋务派的斗争中进行的。因此,研究上述三个方面对清朝制定各种制度和政策的影响,应该是晚清政治内容的主要部分之一。由于这种影响有时是直射的,有时是折射的,所以晚清政治才呈现出复杂性和曲折性。

所谓“五个问题”,是指清朝的行政制度、军事制度、财政制度、考试(教育)制度和法律制度。这五种制度,在国内人民群众斗争和外国侵略者的打击下,不时地发生变化。这些变化既关系到近代社会的发展,又关系到清朝的兴衰。以考试制度的变化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是最清楚不过的。20世纪初,清朝废除科举,设立各级学堂和向外国派遣留学生,资本主义的先进文化迅速传入国内。这不仅加速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而且还猛烈冲击着中国的封建文化和封建制度,从而培养出清朝的大批的掘墓人。其他各种制度变化的程度虽然没有像考试制度那样明显,但在不同程度上也都有所变化,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或以不同形式对中国社会、对清朝的兴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所谓“两条主线”,是晚清政治的主题或基本线索。第一条主线,指的是晚清各个时期对内、对外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及其变化和影响。无论是道光、咸丰,抑或是同治、光绪、宣统各朝,其内外政策都有所变化,有时变化还非常大。这些变化和内容是丰富的,也是很复杂的,只有研究这些变化和內容,才能探讨晚

清的内外政策演变的原因、过程及其规律。例如,道光中期以来,随着鸦片问题的出现,清朝对待鸦片的政策就有过从弛禁到严禁的转变;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响后,清政府又有过从抵抗到妥协的转变,从而成为晚清对外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第一个时期。这些变化的原因既有统治者观念上的问题,也有封建政权结构上的问题,又有清朝军队素质上的问题;其影响既关系到中国的国计民生,关系到清朝的兴衰,更关系到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有关这些方面的问题,都属于第一条主线的问题。

第二条主线,指的是晚清封建中央集权制的变化。这不仅是晚清政治的主题之一,也是晚清政治的核心问题。对清朝来说,不论是制度上的变化还是方针、政策上的变化,最终都要作用于封建中央集权上,而清朝的兴衰,其根本变化又是封建集团的巩固或削弱。只有深入研究晚清中央集权的变化及其原因,才能更好地探讨晚清政治的实质内容。

封建中央集权,就是封建地主阶级专政,其特点是封建皇帝大权独揽,即所谓的“乾纲独断”、“朕即国家”。清朝从入关之始就极端重视中央集权问题,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都强调集权于皇帝,正如康熙帝所说:“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亲理,无可旁落。”乾隆帝说得更为露骨:“本朝家法相承,太阿从不下移。”就是因为清朝统治者视集权为生命,所以在政权建设上他们不仅吸收了中国历代王朝集权的措施和经验,而且还根据自己的需要,独出心裁,想方设法,把政治、军事、财政、教育、法律等一切权力都集中于皇帝手中。例如在设官分职上,清朝统治者一方面设置像军机处那样便于集权的新机构;一方面还分散各级官吏的权力,并使各级政权机构多方从属,以便使之互相牵制,把最后决定权都归于中央。不仅如此,他们还采取以满制汉、以文制武等手段,使各级官吏必须绝对服从中央,一切听命于皇

帝。在清代,特别是在其前期和中期,除了皇帝之外,任何部门或个人都无权决定重大事情,即使本部门的决策性的问题,也都是皇帝说了才算数。因此,清朝从未出现过像明朝宦官专权那样的事情,从而把中国的封建中央集权发展到了顶峰。可以这样认为:高度的封建中央集权,是清朝统治中国长达260多年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中央集权的发展和巩固时期,也就是清朝最兴盛的时期;中央集权的削弱和瓦解时期,也就是清朝衰落和灭亡的时期。

我们所说的晚清,正是清朝从衰落到灭亡的时期,那么,晚清以来中央集权又是怎样削弱和瓦解的呢?

其实,清朝的中央集权自嘉(庆)道(光)以来就出现了削弱的迹象。诸如嘉(庆)道(光)以来,胥吏开始增多,并充斥于各级衙门。本来毫无任何权力的胥吏这时有的也掌握了某些权力,这说明权力的下移有了某种可能性。像有些地方出现了“擅自挪用”“部款”和截留“协款”的现象,皇帝赖以集中财权的解协制度开始遭受破坏。今文经学派的出现,特别是其中有些人物在思想上对封建统治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叛逆。所有这些都说明,清朝牢固的中央集权制度从嘉(庆)道(光)以来已出现削弱的征兆。

然而,清代中央集权制度明显的削弱则是在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期间。咸丰元年(1851)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仅两年的时间,太平军便驰骋大江南北,占领南京,并开始北伐和西征。清朝的八旗和绿营很快瓦解。尽管是清朝统治者很不情愿,但是为拯救封建统治,不得不重用曾国藩为首的地方势力。从咸丰十年(1860)曾国藩被任命为两江总督起,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楨、李续宜又分别被任命为江苏、浙江、江西、安徽省的巡抚。这些人是曾国藩的亲信或下属,他们各自掌握有自己的军队,独

占一方。这样一来,在清朝统治的土地上便出现了地方实力集团。

自从这些地方实力集团出现之后,便想方设法寻找各种机会进一步扩展自己的势力。通过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趁着清朝皇帝必须依靠他们的机会,特别在洋务运动中他们又多是洋务派的主将,不仅具有很强的政治实力,而且握有相当大的军权和财权。因为他们掌握有一定的军权和财权,清朝中央的军权和财权开始下移,“朕即国家”的局面开始遭到破坏。一句话,自从地方实力集团出现之后,清朝维持了近200年的“内重外轻”的局面开始向“外重内轻”方面转化。这说明皇权下移,中央集权制开始削弱了,清朝的整个统治削弱了。

当时的清朝统治者,特别是慈禧太后曾想尽办法试图改变这种状况。她在设法增强中央集权的同时,又只好变换统治术来加强对地方集团的统治,诸如用一打一拉和阴一套阳一套的办法来控制各级官吏。虽然慈禧的统治术有过一些成功,但始终改变不了中央集权制逐步削弱的趋势。

日本侵华的甲午一战,促成了戊戌变法的发生。这一运动虽因慈禧发动戊戌政变而失败,但运动本身就是对中央集权的一次冲击。在这次运动中,维新派从理论上对中央集权制进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批判。康有为在很多文章中都表述了他的立宪法、开国会的思想,主张“君民共治”、“许民上书”。严复更是提倡民主,倡导“鼓民力”、“开民智”,以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来代替封建专制制度。谭嗣同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尤为尖锐,他的矛头曾直指封建君主,认为“三纲之名”是一大害,而“彼君主者”却又“独兼三纲而据其上”是君主“便己之故”,认为君主应是民共举的,故“君末也,民本也”。他们这些言论和主张的提出可以说是破天荒的,也正像当时顽固派们所说的,他们是“欲散

君权”。这些主张虽然在当时没有实现,却在当时的知识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过去,君主至上、“乾纲独断”的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是根深蒂固的,而经过戊戌变法之后,许多事实都表明,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而成为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迅速兴起的重要原因。皇帝神圣的观念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上发生了动摇,意味着封建中央集权制已经被进一步削弱。

封建中央集权受到更严重的打击则是在义和团运动期间。自从戊戌政变之后,慈禧准备废掉光绪帝而另立溥仪为大阿哥,一时间,顽固派齐集于慈禧的周围。当光绪二十五年(1899)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后,顽固派与洋务派在对待义和团以及外国列强的态度上形成严重对立。前者对义和团主抚,对列强主战;后者对义和团主剿,对列强主和。为此,慈禧不惜在北京“伏尸都门”,杀掉洋务派五位大臣。但是,在北京以外的洋务派官员们却坚持自己的主张。当慈禧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二十五日宣布对外宣战的上谕之后,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便联络沿江各省督抚,其中包括两广总督李鸿章、江苏巡抚鹿传霖,宣布宣战上谕为“矫诏”、“乱命”,凡宣战之日以后的上谕他们“概不奉行”;不久,他们又通过盛宣怀从中引线,在上海同各国驻上海领事签订了《中外互保章程》,和外国列强携手实行“东南互保”。他们的行为俨然与朝廷要闹分裂的架势。地方督抚不仅不遵从皇帝的上谕,反而公开反对,并采取与中央背道而驰的方针、政策,这在清朝来说是史无前例的。此时地方督抚的权势膨胀到了何种地步,清朝的中央集权又削弱到何种程度,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地方实力集团的目的只不过是执行慈禧和顽固派的政策,并不想和清朝中央闹对立,更不是要推翻清王朝,相反是要维护它。而外国侵略者就不同了。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外国

列强对清朝政府采取变瓜分为“保全”的政策,把清政府置于他们的完全控制之下。通过谈判,不仅迫使慈禧惩办“祸首诸臣”,翦除了清朝中央内部的反外势力,最后签订了《辛丑条约》。从这个条约的内容可知,所谓“保全”,正如当时有人揭露的,是“托保全之名,行灭国之实”而已,时人说清政府当时已成为“洋人的朝廷”是完全有道理的。在这种情况下,清朝的封建中央集权已处在即将崩溃的边缘。

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起,清政府开始推行“新政”。其原因确实是有取悦外国侵略者的因素,但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传统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出现了危机,只好迎合一些社会要求,实质是变换一些手法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从“新政”的内容看,确实做了一些改革,应该说是真维新。但从其结果看,却在许多方面事与愿违,不但没有巩固或加强清朝的统治,反而又进一步削弱了封建中央集权。如废科举、设立各级学堂以及向外国派遣留学生,不仅在教育方面削弱了中央集权,而且加速了资产阶级民主力量的增长。特别是编练新军问题,不仅增强了地方实力集团的实力,而且培育出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

进入20世纪之后,资产阶级革命力量迅速兴起,特别是从光绪三十一年(1905)同盟会成立之后,资产阶级革命派把“民权”作为口号之一的革命思想,已在全国和海外深入人心。这对清朝的冲击来说是史无前例的。不仅如此,由革命派发动的、遍及全国的武装起义对清朝的打击更为严重,清朝统治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内部的立宪派便开始大肆活动了。

清朝宣布预备立宪,是革命势力壮大并对清朝统治者沉重打击的结果,因为立宪派是为了瓦解革命和挽救清朝统治才大搞立宪活动的。他们想用立宪来代替革命,迫使清朝统治者让

出部分权力以保护清朝统治。事实也是如此。以《钦定宪法大纲》来说,尽管它对“君上大权”的规定尚有 14 条之多,但在前言中毕竟指出了宪法是“国家之根本大法”、“自天子以至庶人,皆当率循,不容逾越”;对于“总揽司法权”,它也规定“不以诏令随时更改”;它还确定了“臣民”的一些权力,诸如对私人财产“无故不加侵扰”以及言论、著作、出版自由等。除此之外,以“庶政公诸舆论”为宗旨的资政院和谏议局的成立,其章程中有许多条文限制了君权和地方督抚之权,这对向来由皇帝一统天下的状况而言,无疑是极大的变化。

总的来说,宪政中所规定的一切,对清朝的中央集权来说带有否定的意义,其中确实在一些方面也剥夺了皇帝的权力。正如时任吏部主事的胡思敬所说的:“立宪之法”使得“国本摇矣”!在他看来,立宪无异于篡夺君权。他的这种忧虑是有道理的。正因如此,我们才说,立宪使得清中央集权处于崩溃的边缘。当然,也像太平天国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向地方督抚放权一样,倡导立宪的结果又是与资产阶级革命力量兴起有着直接的关系。

前已述及,这些思考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史学界对晚清政治研究非常不够的情况下提出的。本书收录的文章,主要是学生们的硕士论文(其中大部分已经发表过),而这些论文基本上是从上述思考中确定的命题。有的文章是他们毕业离校后不久对这些问题继续研究的成果,有的文章的命题也与上述思考有一定的关系。毫无疑问,20 多年过去了,史学界对晚清政治的研究已经取得很大的进展,其中对某些问题的研究,早已突破了上述思考。尽管如此,我们今天仍然不揣冒昧为读者奉上这本论文集,一是想通过这本集子反映我们 20 多年来在晚清政治研究领域里的轨迹,所以对所收论文只做了一些技术性的修改,观点、史料仍如其旧;二是因为这些文章在写作和发表的当时是

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的,甚至其中的不少文章到现在仍具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对晚清史学术研究具有一定的贡献,算是对我们研究晚清政治问题的一个总结。

2008年2月

目 录

浅谈三缘关系与晚清政治	杨荣春(1)
试论清代中央集权体制的结构特点	何 瑜(8)
论鸦片战争前夕封建中央集权的初步削弱	杨荣春(20)
晚清中央集权体制变化原因再析	何 瑜(58)
论“同治中兴”	任念文(77)
略论洋务运动与晚清政局之关系	冀满红(104)
晚清同光政局论析	关 威(113)

论道咸之际清朝的外交政策	孟 潇(122)
乙未至庚子清朝对外态度和政策的演变	郭丽萍(146)
地方督抚与清政府对义和团政策的变化	冀满红 白文刚(184)
论清政府预备立宪的客观效果	贾 珊(199)
论晚清政府对东南亚华侨的保护政策	冀满红(234)

咸丰朝妥协派的形成	郭卫民(248)
洋务派矛盾心态析	殷俊玲(281)
论晚清的前期清流	邹范林(290)
也论中法战争时期的主战派	杨跃年(302)

2 晚清政治散论

淮军的私人化倾向	冀满红(331)
清季直隶练军述论	冀满红(342)
近代皖北乡村社会统治危机与淮军的产生	冀满红(355)
皖北乡土因素与淮系集团的发展	冀满红 白文刚(368)
试论甲午中日战争时期的帝党	任茂棠(381)

析神光寺事件	任茂棠 杨荣春(397)
--------------	--------------

(1) 春荣辞	任茂棠(397)
---------------	----------

(8) 辞	任茂棠(397)
-------------	----------

何桂清与咸丰帝的对外政策之争及其影响	郭卫民(402)
--------------------------	----------

李鸿章对外之矛盾心态浅析	殷俊玲(416)
--------------------	----------

再论李鸿章与中法战争	关 威(424)
------------------	----------

论吴大澂	邹范林(457)
------------	----------

关于刘坤一的几个问题	孙向明(465)
------------------	----------

有关翁同龢评价的几个问题	任茂棠(494)
--------------------	----------

后 记	(505)
-----------	-------

(141) 转面辞	任茂棠(397)
-----------------	----------

(181) 转面辞	任茂棠(397)
-----------------	----------

(191) 转面辞	任茂棠(397)
-----------------	----------

(195) 转面辞	任茂棠(397)
-----------------	----------

(145) 转面辞	任茂棠(397)
-----------------	----------

(185) 转面辞	任茂棠(397)
-----------------	----------

(195) 转面辞	任茂棠(397)
-----------------	----------

(195) 转面辞	任茂棠(397)
-----------------	----------

浅谈三缘关系与晚清政治

杨荣春

三缘关系(血缘、地缘、业缘关系)是现代社会学考察社会历史的一个基本范畴。本文拟对三缘关系与晚清政治的关系加以简单剖析。

群体是人在社会中存在的普遍形式,个人对于群体有着多层次的归属关系。根据个人对于群体的归属性质,可以把群体划分为三个层次,即首属群体、次属群体、隶属群体。首属群体,如家庭、家族;次属群体,如团体、派别等;隶属群体,如民族、阶级等。在首属群体中,人际关系最直接、最简单,大多以血缘和地缘为主;而在次属群体和隶属群体中,则业缘关系占主导地位。血缘关系是以血统或生理联系为基础的关系,包括父族、母族、妻族;地缘关系是以空间和地理位置为基础的邻里、乡党等关系;业缘关系是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同业、同学等关系。这三种关系在任何社会都普遍存在,它与群体的各层次互为表里,群体的范围越扩大,人际关系的纽带也就越高级。低级群体与初级组带的准则应该服从高级群体与高级组带的准则。在各级群体中,三缘关系的功能也是双向的,其正功能主要是维系社会的凝聚力,维护社会的稳定;其负功能则主要是由惰性、封闭性、局限性引起的阻碍社会发展的作用。这种正负功能的发挥因时代不同而不同,与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在语言习惯、心理习惯、价值取向以及思维方式等方面有自己的特点,与西方文化以个体为本位的契约性人际关系不同。中国文化以群体为本位,以家庭为中心,以忠、孝、节、义为准则,强调家庭和家族在人际关系中的作用。人际关系的网络结构是从家庭出发,由小而大,由近而远,由亲到疏延伸扩展的结果。至晚清时(道光朝以后),这种人际关系结构与封建剥削制度牢固结合,人口的绝大部分附着于土地之上,社会生活仍局限于首属群体范围之内,即使是一些文人士子和官僚,他们的社会流动和人际关系纽带也绝对地偏向首属群体层次。尽管当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激化时,他们会不自觉地维护隶属群体的利益,但他们考虑的重心仍会自然地落到首属群体和次属群体的利益层次上。中国近代化过程步履维艰与中国社会中首属群体、次属群体的强化有着重要的因果关系,我们可以从三缘关系在晚清政治中的作用方面加以透视。

亲缘关系为核心的宗族制度与晚清军队私人化

以姓氏为标志组成的家庭、宗族组织一直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细胞。在封建社会,首属群体与自然经济的稳定性、内向性、封闭性相表里,又与封建专制制度巧妙地整合。首先,封建皇帝及其家族以世袭制方式,把持着封建统治的机器。其次,封建政权与家族制度的耦合,对社会生活全面控制。政治上,政府实行孝廉方正、节妇义妇制度,表彰模范宗族的孝子贤孙,并吸收一些宗族人才,从精神上控制民众。同时,不仅在法律上肯定宗法关系,而且往往正式赋予族长、族正管束族人的权力,“族房之长,奉有官法,以纠察族内子弟”^①,宗族组织成了政权的自然延伸。经济上,宗族总有一定的公共经济——祠田、族田、义庄、学田等形式,在宗族内部实

^① 《庐江章氏义庄记》,《魏源集》下册,第503页。

行互助;宗族“廩其谷若干,以周族之贫者、老废疾者、幼不能生者、寡不嫁者。粃其余米,为钱若干缗,以佐族之女长不嫁者,鰥不能娶妻者,学无养者,丧不能葬者”^①,为宗法关系提供一定的经济保障,政府也对其实行保护政策,以稳定封建经济关系。财政上,宗族组织总是封建国家赋税制度的保护者,一般族规都要求族人“以完国课为先”,“照限完粮,夏熟秋成,及期完纳,毋累官私”。^② 这样宗族制度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及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相互依存,构成一个有机整体,维持着封建社会的稳定。当社会动荡、封建制度遇到挑战的时候,宗族组织就将首属群体利益与封建统治阶级的隶属群体利益不完全地统一起来,或调整结构,或分担功能。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两江总督陶澍的儿女亲家左宗棠就因为陶家“以独富处众贫之中,一夫狂呼,克为祸首,又地当宝庆之冲,会匪、烟枭潜滋已久,一旦蠢动,祸在门庭”,计划“营一险僻之处,为他日保全宗族、亲党计”。^③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他就很快将全家迁居湘东“白水洞”,“诛茅筑屋为自保计,亲党多从避乱”。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无不是以封建家族势力为基础,趁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之机,扩大家族武装,编练乡勇,使其成为只效忠于自己的私人武装。湘军中曾姓的高级将领有曾国藩、曾国荃、曾贞干等。以周宽世为首的“铨”字营全军各级 36 员将领中,周姓者达 12 人,足足占了 1/3,都是主帅的亲族^④。李姓为首的淮军中,高级将领李鸿章、李鹤章、李昭庆;刘姓为首的铭军中,主要高级将领刘铭传、刘盛藻、刘盛休等之间都有亲缘关系^⑤。这种家族化了的私人军队,不听中央调遣,唯主将马首是瞻,逐渐改变了晚清君主专制统治的政治格

① 《庐江章氏义庄记》,《魏源集》下册,第 502 页。

② 《张氏家宗谱》卷二《家规》,转引自戴逸主编《简明清史》下册,第 21 页。

③ 《左文襄公书牍》卷三。

④ 朱孔彭:《中兴将帅别传》卷三,第 8 页。

⑤ 《曾文正公手书记》(同治二年三月初二)。